

中原时评

■个论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的记忆责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草案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一些大学生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纪念日,这在今天的中国,已是一种普遍现象。除了“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偶尔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我们极少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也没有过全国性的遇难者公祭。作为二战战胜国,我们既不像欧洲战胜国那样每年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甚至都不像战败国日本那样每年8月15日都搞纪念活动。

历史教材里学习不到,现实生活里感受不到,于是那段历史,被很多人遗忘了。我们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我们愤怒日本篡改历史,自己却已悄悄将之遗忘,这是多么讽刺的事,也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我们的抗战纪念之所以如此尴尬,原因尽人皆知;然而,人回到过去干预历史、改变历史的“选择历史假想”,早就该抛弃了。认真对待抗战历史,让抗战研究“脱敏”,完整写进历史教材,告诉子孙后代。

以立法形式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历史追偿。历史不升级为文化,耻辱就容易遗忘。国家级的纪念活动,影响深远的史诗作品,以及内涵丰富的纪念馆等,所要完成的任务只有一个:建立强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堤防,将

抗战历史嵌入民族记忆,使其不再只是由一组数字构成的历史填空题,升级成为民众能够真切感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的文化记忆。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以战胜国的姿态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以国家层面的公祭告慰惨遭杀戮的同胞,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责任。正如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与伦理》中所指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共同灾难,不是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人类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情。

历史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不惜捐自身之血肉以搏国家民族某一事之胜利与成功”的抗战烈士们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以国家的高度,以民族的名义,以立法的形式,纪念抗战胜利,公祭死难同胞,表明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这既是要对先烈表达敬意、对死难同胞表达哀悼,也是要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向外传递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信念。

拂去历史的灰尘,擦亮尘封的记忆,让所有的遇难者都找到自己的名字,让纪念碑矗立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我们的记忆责任。就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照壁上所篆刻的,“让白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 舒圣祥

■个论

病榻上的张悟本为何还没醒悟?

2月26日上午,记者在北医三院神经内科病房见到曾经的“神医”张悟本。床头的病卡记录显示:张悟本于2月20日入院,脑梗。张悟本表示,脑梗是发生在4年前,也就是被媒体报道的两个月后,是被媒体气的,这次只是来做健康检查,“以后我还会宣传这套食疗养生理论”。(2月26日《新京报》)

4年前,媒体关于张悟本伪造学历、夸大宣传的报道,让所谓的“神医”走下神坛;如今,“神医也住院”的黑色幽默,彻底让张悟本宣扬的包治百病理论不攻自破。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为什么不喝点绿豆汤”便成为网友们调侃张悟本的流行语。

不过,躺在病榻上的张悟本,却不以为然。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坚称脑梗是被媒体报道气的,自己的食疗养生理论没有错,并表示以后还将通过口口相传的办法继续宣传下去。当初,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曾召集6位国内顶级专家,对张悟本错误的养生说法进行批驳,曾经所谓的经典偏方被一一证伪,沦为笑柄,为何张悟本本人依然入戏太深?当然,一个人独自吟唱也就罢了,却又为何还在幻想继续拿这套东西招摇撞骗?

伪神医、伪养生大师,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其绿豆养生神话破灭后,南京护士马悦凌又凭借生吃泥鳅治疗“渐冻症”等论调声名鹊起,被冠以“健康教母”的光环;“拍打拉筋神功”推广者萧宏慈,更是宣扬一张凳子加一根棍子就能治百病治万病、靠销售“拉筋凳”年赚千万元。与“神医”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相比,滋生“神医”的社会环境和土壤更值得关注 and 反思。或许,正是以下三

方面因素,给了张悟本“我还会再回来”的底气。

其一,公众健康素养的缺失。张悟本之流的走红,关键是钻了公众养生需求强烈和健康素养匮乏之间的空子。相关调查显示,2008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仅为6.48%,这一数字到2012年也只提高了2.32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权威的、科学的、准确的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不通畅,导致许多想养生又不懂养生的市民,很容易偏听偏信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

其二,非医疗养生监管漏洞。对于医疗机构从事中医养生保健,国家是有明确的管理规定,但对于在非医疗机构中开展相关活动一直缺少监管。张悟本事件发生后,时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邓海华曾经表示,正在研究非医疗养生咨询监管办法。不过,直到现在也没见相关制度出台。

其三,媒体出版社盲目包装。一档《百科全说》电视节目,让张悟本一炮走红,一部《不生病的智慧》的畅销书,让马悦凌和她的固元膏风靡全国。几乎每一个“神医”的背后,都有媒体、出版机构在推波助澜。为了收视率、阅读量,盲目追捧各种新奇特的养生学说,而不加以科学论证和分析,使得一些媒体出版社很容易沦为炒作推手,误导广大受众。

目前,我国健康产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超过15%,巨大的产业发展前景,是机遇更是挑战。如果真专家、真科学不能占领公共保健阵地,非医疗养生监管和文化传媒机构自律无法跟上,张悟本之流卷土重来或许并非痴人说梦。 张枫逸

■街谈

反思“撞伤不如撞死”当规避谬误传播

深夜,一辆皮卡车撞伤过路老者,司机下车查探后没有施救,而是返回驾驶室,点火、启动、掉头,车辆第二次从老者身上碾轧过去……被撞老人身亡,驾驶车辆的大学生张庆达被捕归案,这起在甘肃嘉峪关上演的“药家鑫”案,轰动当地。嘉峪关市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庆达有期徒刑15年。(2月26日《北京晨报》)

从“药家鑫”案到张庆达案,对于横遭车祸的不幸者,肇事者为何一再守不住良心的底线?如螺旋式重演的悲剧,到底是相关制度之恶,还是人性的“平庸之恶”?种种疑问,伴随着所有善良人的内心。

回溯张庆达案的案情,点火、启动、掉头,车辆第二次从老者身上碾轧过去。细节之残酷,更像是倾诉张庆达已魔鬼附体。但如果检索类似案件,我们可以发现,在相关案件当中,其他肇事者的冷酷亦不输于张庆达。这说明,在此类人心中,“撞伤不如撞死”论犹如一个“生活常识”,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内心。

而当一个人面临突发处境时,最信任的往往是其所认为的“生活常识”。我想那一刻,张庆达一定左右衡量。撞伤,按交强险,只能赔一小部分,但受伤者因为身体原因影响生活等因素,必然会向他提出更多的赔偿。而撞死,对他而言,赔偿负担就轻了许多,他可以全部依靠交强险来厘清责任。

撇开这种结果的非道德因素不谈,这种构想也只能是理论推演。以现实而言,撞死的后果,远比撞伤要更加沉重。当事故已经发生,撞伤还是撞死,往往容不得人们考虑。而如果这中间可以选择,故意选择撞死,那就是人性里最丑恶的一面,当以法律严惩其暴行。更何况,张庆达案远不存在这个选择,当事故发生时,被撞者只是受伤。而当张庆达驱车二次碾轧他人以致碾死,显而易见的谋杀事实,已让事件性质根本逆转。原本只是车祸之忧的张庆达,此时却已深陷“故意伤害他人性命”的泥潭。

张庆达案已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如此明显的法律常识,却敌不过“撞伤不如撞死”的谬误?从现实环境来看,我们对于类似法律常识,普及力度还远远不够。人们接受新知识的渠道,主要依赖于现代传媒。而一些媒介关于“撞伤不如撞死”的反复渲染,虽其用意在于讨论交强险之是非,但由于立错了靶子,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固化刻板印象的作用。一如“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让一些法律素养不高者对交强险没有熟悉,却对“撞伤不如撞死”引以为圭臬。今天,我们反思张庆达案,就应看到传播之于心理的作用,对于类似事件,注重规避谬误传播,以法律常识击破“撞伤不如撞死”论调,涤荡人性深处那隐藏的恶。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街谈

处长夫妇挥拳打医是一种“权力病”

25日晚,微博账号“@江苏身边事”爆出“南京口腔医院护士医生被打”。随后有网友指出,打人夫妻为江苏省检察院宣传处官员董安庆与江苏省科技馆副馆长袁亚平。26日上午11时左右,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通过微博回应了该事件。该院称,经研究决定,即时停止董安庆履行处长职务,接受纪检部门对其问题的审查。此外,该院表示,将抓紧时间认定其应负的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该院称,将坚决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事。(2月26日新京报网)另据记者从医护人员处了解到,受伤护士可能面临下肢瘫痪,仍在医院治疗。

夫妇二人皆为处级干部,身上的“官德”应该高于寻常人的私德才是。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董安庆、袁亚平夫妇,仅仅因为夜里急诊外伤病人收住进入其家属的病房,便大闹医院,拳打医护人员,导致一名受伤护士“脊髓损伤、心包胸腔积液”,并“可能面临下肢瘫痪”。对此我们难免会问,一对“靠拳头说话”“以拳头打出威风”的处长夫妇,行事风格难道一贯厚黑?

处长夫妇一生气,后果真的很严重。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冲冠一怒”?当然还是床位,以及它所衍生的官员面子及单间待遇问题。医院床位紧张,是“中国式医疗”叙事语境中一个极其常见的表述。绝大多数公众对此都表示出了理解和宽容——因为在医疗资源相对短缺、多数公立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床位使用率和周

转率的提升,意味着有更多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所以谁也不愿多占床位,更不可能超越现实条件去追求所谓的单间待遇。

然而这只是普通人的想法,某些特权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习惯了多吃、多占公共资源,习惯了高人一等的“超国民待遇”,习惯了无所不在的优越感。让他们像寻常人一样排队取号、与众多病患挤在一个狭小病房里,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处长夫妇的愤怒和戾气,大约也就滋生于此。

出离权力常态的特权意识和特权追求,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病”。处长夫妇在挥拳怒打医护人员之际,也暴露了他们灵魂深处的病变,暴露了他们对底线道德、制度规则、社会伦理的轻视乃至亵渎。难道去年已深入进行的整治“四风”、切实转变作风行动,就没有吹进他们的灵魂?难道身为省检察院宣传处处长的董安庆,对朝夕相处的法律公器也没有产生过丝毫敬畏?难道一对官夫妻、两个大处长,在官位提升之后脾气即长,真的彻底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

权力一发“烧”,行为就出格。对于仗权欺人者,就该早日医治。当然此等作风病、权力病不归寻常医院治疗,它们需要公安、纪检等特殊“医生”,其治疗处方及药品就是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所以,我们期待着南京市相关方面承诺的彻查以及“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包庇姑息”,能够尽快用行动兑现,给被打者也给公众一个说法。 张培元